

武重年自传 (《世纪》 杂志)

(1938—)

我名武重年，因出生在重庆，名字中的重是因地而取。

家世

我祖籍山西省文水县贯家堡 (现属胡兰镇)，离刘胡兰的云周西村十里地。

文水县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题字) 武则天的家乡。1957 年 7 月 7 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咖啡厅接见上海各界人士代表，与我父亲同坐一沙发谈话时，听我父亲口音，问：武先生，你是何方人士？我父亲答曰：山西文水人。毛主席脱口而出：噢，你是武则天的本家。谈话时的照片一直放在我家客厅。

我的父亲武和轩，又名肇煦，出生于贯家堡。年青时东渡日本，就读于帝国大学 (现在的东京大学) 政治学专业，毕业返国，在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蒙藏委员会任职，后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在国民党内，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末，他一贯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在 1946 年的“制宪国大”上，当场指责蒋介石的反民主行径，轰动中外舆论。他很早就参加了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民联)。

1949 年 9 月，他与 52 位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联名宣布起义，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投向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 1949 年 11 月举行的中国

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历届连任，最后任民革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顾问。他长期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副秘书长、市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病逝于 1986 年，终年 85 岁。

我的母亲祁醒华，山西寿阳人，出身名门。他的曾祖父祁寓藻为清道光、咸丰两朝帝师、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祖父祁世长，是清光绪朝工部尚书。我的母亲 20 世纪 20 年代任职于南京市政府，解放后参加民革，一直从事家属工作。我的舅父祁式潜（党内曾用名徐大可），20 世纪 30 年代就读于金陵大学，参加革命，曾为南京学联负责人。抗日战争时期，与同盟会、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之女成婚，共同战斗在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以后长期在中共上海局吴克坚同志领导下战斗在中共情报战线上。我的堂舅祁式之（党内用名肖大成）也是情报战线一员，直接指导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陆大公等的起义，在“文革”中都被迫害而逝。

我于 1938 年 10 月出生于重庆，后在四川巴县（时国民政府许多部门为免遭日军轰炸，迁往巴县乡下）度过了抗战时期。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受到他们的教诲，也经常得到舅舅们的教育。因此，从我父亲的角度看，我可算作国民党的后代；从舅父的角度说，我也可算成共产党的后代。

上学

6 岁时，我从居住地——四川巴县西永乡永兴场三重堂（何姓地主大院）步

行 4 里路到场（镇）上小学读二年级（没念过幼稚园和一年级）。抗战胜利，全家在重庆等回南京的飞机，一年多没上学。1946 年起在南京继续读三年级。1948 年到 1949 年，随父母为避反动派的迫害躲居上海，一年多又没上学。1949 年上海解放后回到南京继续上学，1951 年春从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大石桥附小毕业，到上海 62 中学念了五年半（2 年半初中，3 年高中）。

因为我在中学一直文、史、地各科成绩优秀，1956 年被免考进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大学四年，一直学习、生活在中国人民大学铁一号校区。铁一号，即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一号，解放后也称张自忠路。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时的政府所在地，著名的“3·18”惨案就发生在这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史档案系、马列主义研究班都设在此校区。

大学期间，我多次聆听吴玉章校长讲话。每年开学和纪念“七·一”，学生都要聚集在铁一号七楼前广场上听吴老报告，他的四川口音、长者对青年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至今不忘。这位辛亥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辈，永远是我崇敬的革命家。

1957 年的反右运动，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的政治运动。全系不少同学被打成右派，另一些同学被划为“中右”，开除出共青团、共产党。我因年龄小，在三分之二的同学是调干生和共产党员的小班里（30 位学生中 20 位共产党员、10 位共青团员），我不会发言，也不可能发表意见。我被当成“中左”，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算是不错了。特别是班的学生党支部书记（班的最高领导）邹家炜

为人正派、有魄力，他保护了同学，我们小班没有一个划成右派，他一直受到全班同学的尊敬。我听过后来被定为“极右”的法律系同届学生林希翎的“报告”，看过林希翎与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黄绍竑关于镇反、肃反扩大化上书中共中央的“万言书”，参加过批判林希翎、葛佩琦、王德周（这二位老师被指控“要杀共产党”）的大会，听到支持过林希翎主张的一位学生“一杯没有颜色的毒药我喝了下去”的批判林的发言。（据说这一位后来没被划为右派。）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第七次科学讨论会，实为批判中国历史学尚钺教授，批判他主张中国魏晋封建说，是反对毛主席的论断。大学一年级，中国通史就是尚钺老师教的，教材用的是他的《中国历史纲要》，我期末考试，作“秦始皇功过”题，得了满分5分（时实行5分制）。因此，我们这些尚老师的学生就被置于“讨论会”最后几排，接受教育。尚钺老师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20世纪80年代，尚钺老师被恢复名誉，逝世后被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出版了他的遗作“尚氏中国通史”。我的很多历史观点，受到尚钺老师的很大影响。也始终为这一位1927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老革命、著名历史学家、朝鲜领袖金日成的革命启蒙老师的命运，感到不平。

1958年，大兴“拔白旗、插红旗”，批判“白专道路”和“向党交心”。我突然成了一个小典型，在校学生大会上，让我上台发言，向党交出了“想参加民主党派”的“心”，还受到表扬。其实，作为不到20岁的我，也就是受父辈影响而已，根本不懂民主党派不可以发展在校大学生。“交了心”，也就是说一定要跟共产党走，要争

取入党。

1959 年底至 1960 年初，我们四年级大学生到京郊密云县新城子公社新城子大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大雪纷飞的严寒日子和贫下中农一起开会、干活，实际体会到农村“大跃进”的后果。

这些政治运动，从正面、从反面，对我都是终生难忘的教育，使我很快地接触到现实的政治、现实的社会，帮助我很快地成长。

大学四年，劳动是必修课。1958 年春天，我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那是人生第一次超强度的体力活。挑近 150 斤的沙石到大坝上，每天实干八小时；从宿营地到工地来回得 4 小时；晚上听从解放军同志的指挥，用开水烫脚；肩上了棉垫肩，仍然压得红肿；中午是窝头加咸萝卜条为午餐，这些都是人生第一回。年青人经过强力锻炼，在以后到工厂做工、下煤矿挖煤（1958 年秋实习时到河北井陉煤矿）、农村收山芋、冬天刨冰起猪圈肥、趟着齐膝的雪上山砍柴禾，等等，都不再视为畏途。至于到了“文革”，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参加农村“三夏”“三秋”、工厂劳改、挖防空洞等等，更不在话下了。对我来说，劳动苦而累，但坚持下来，苦中有乐，身体未垮，反而健壮了，可谓“思想、身体双丰收！”

读书学习、政治运动、苦力干活，是大学四年生活的三步曲，也是人生路上的关键。

1956 年至 1960 年，我每年都参加了首都国庆大游行。三次在天安门广场作为军乐团、少先队的护卫队，仰望天安门城楼，欢呼毛主席万岁。1958 年国

庆,目睹彭德怀国防部长阅兵时的风采。当他的敞蓬检阅车开过大学生队伍前时,学生报以热烈的掌声,彭德怀元帅立即给大学生们敬一个标准的军礼。1959年庐山会议,罢了彭总的官,那年国庆阅兵是新任国防部长林彪,没有了彭大将军的威武。1959年国庆十周年,我参加了首都群众游行仪仗队。9月一个整月,每天在总参谋部军官的口令中,练队列,正步走。100人一排的仪仗队以一分钟72步的正步走的优异表现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也是我人生一大幸事。

工作

1960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回上海工作。到市人民委员会人事处报到,被告知华东和上海正在精简机构,不能去上海市档案馆了,改分配去上海图书馆。我们一行11位同学是1959年建馆的上海市档案馆向中国人民大学申要的。我们历史档案系的创办者、系主任吴宝康教授是新四军老战士,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从华东局调至北京开创中国高等档案教育,特别关心上海,给了上海一地一馆最多的毕业生。真实的情况是执行当时的阶级路线,像我这样家庭出身、又不是共产党员、虽大学成绩优秀,也不允许到带有机要性质的档案馆工作。于是9位同学都如同我一样,毕业即转业。1980年,我专业归队后,上海市档案局原主持工作的副局长罗文同志(我们吴宝康主任在华东局时的同事)对我表示当年不能分配档案馆工作的歉意。

在上海图书馆,在党的“干一行、爱一行”教导下,潜心业务。报考了北京大

学图书系本科函授班，几年苦读，结合工作实际，以优异的成绩又得本科毕业证书。1960 年到 1980 年 20 年间，先后从事读者阅读指导、图书资料咨询、报刊索引等书刊编辑工作，参与编辑了《上海地方资料目录》、《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等工具书。业余时间，以共青团干部身份，做团的青年工作，组织部门职工政治学习，组织职工文体活动。工作、学习、活动，顶着阶级路线的压力，还是能愉快地生活。

1964 年秋至 1965 年夏，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农村“四清”运动。到上海市金山县泖港公社胜利大队六队，任工作组负责人，与一位同事、一位应届大学毕业生共同工作。心不忍整人，于是通过与贫下中农开会和调查，仅对生产队长、副队长以“多吃多占”扣一些劳动工分了事。但引来上面左的领导批评，认为我“右倾”，加派一共产党员干部来生产队，调查结果，我做得正确。适 23 条下达，我所在生产队，队长认真抓生产，“四清”顺利了结。不像某些左得整人过头的“四清”工作队员出现走不掉、结不了的窘况。我自信对得起贫下中农、对得起生产队干部，也对得起我的良心。

“文化大革命”冲击我的全家。之前的 1964 年的“反击资产阶级大反复”(党内是批判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我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而父亲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认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市政协大会上，念了我代为起草的“检讨”以后，被取消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革市委秘书长职务，(我父亲苦涩地戏称之为“三家分晋”)保留民革市委

副主委，排名从第一放置于最后。子女受株连，有关方面书面通知子女所在单位，导致我的二哥（南京解放后即参加人民空军）停飞十年的遭遇。“文革”中，父亲被抄家、批斗、挨打、扣工资等均不能幸免。批判陈丕显、曹获秋同志的大字报专栏贴到上海图书馆外墙。于是墙内大字报称我为“反动政客狗崽子”，“揭出”我在1962年部门学习会（我是召集人）上的发言，谓与蒋介石反攻大陆遥相呼应。

工军宣队进驻后，将我与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发配至上图工作的老革命苗力沉（曾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朱济忍（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际处长，与我舅舅解放前一个地下党支部）等的密切交往，认定为“一贯包庇坏人”、“反对工军宣队”等罪名，靠边审查。继而借“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所谓“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命令，将我发配至上海人民工具厂（重工业弄堂小厂）淬火车间三班倒劳动，工资也转往工厂，似有当一辈子工人之意。但之后得知，本人成份不能改为工人，于是借用父亲由警备区联络部约稿，为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撰写的对台广播稿中谓“三儿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之语句，使得市文化系统工宣队团部将我调往“上海工人政治学校”（即王洪文等的“帮校”），帮助建设图书馆。在工人政校干了两年，建设好图书馆，努力为学员服务，得到上下好评。但婉谢工人政校党委书记迟群（警备区某师首长）的挽留，离开了整天讲阶级斗争的是非之地，返上海图书馆继续工作。与苗力沉等同志互相交流、互相鼓励，迎来了“四人帮”的覆灭。

离开上海图书馆后的1984年，我与妻在静安区中心医院住院部探视因病住

院的母亲，途径上图，突然发现西大楼（办公大楼）三楼一房间冒出黑烟。我曾接受过业余消防队训练，敏感到有火情。因在这大楼工作多年，熟悉，就立刻跑进西大楼，冲过已经烟雾弥漫的楼道，到三楼发现电线走火的房间，随即用各种灭火器材，与已经在场的李世雄同志（他正在危险地用水扑灭电走火）一道将会引起大灾的火扑灭。待消防队赶到时，火已熄灭，此时早已忘记生死的我，方才感到被浓烟熏得口干、脸黑、眼红。事后，上图广大同志给予我极高的评价和赞许，受到当时工作的上海大学的表扬。我认为这是我对工作多年的上海图书馆应尽的一点责任。

教书

1980年2月，应复旦大学分校党委书记李庆云同志的召唤，专业归队，到复旦大学分校任教。初始在图书馆学系讲授《目录学》和《中国近代思想史》，同时筹建档案学专业。在图书馆学系张君炎主任的领导下，于1981年建立上海高等学校首个档案学专业，从1981年设两年制档案学专修科、1982年设图书馆学与档案学专业四年制本科、到复旦大学分校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后的1986年建立档案学系，我先后担任档案学教研室主任、档案学系副主任、主任。主讲《档案学概论》、《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国家机关史》等专业课，作为编委、分科主编，参与编写中国首部《档案学辞典》，发表论著多篇（部）。

我们档案学系，与上海市档案局、档案馆、档案工作战线成为一家人，为上海档案事业培养了数百名专业人才，成为各级档案部门的骨干和领导者。经我努

力争取，上海市档案局长、档案馆长张乾同志全力支持在上海大学档案学系设立了学生专业奖学金，与上海大学共建档案学系。专业归队后，作为上海高等档案教育的主要创办者，为上海市高等档案教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上海大学教书期间，我担任中国档案学会理事、上海档案学会理事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出席了第 13 届国际档案大会，1987 年参加上海档案代表团去美国访问。担任国家教委高等档案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上海市档案教育先进工作者，获得上海大学王宽诚育才奖。

我整个大学教书生涯，与中国改革开放分不开。是改革开放创造了高等教育大发展和档案事业大发展的机遇，也才有了我在高等档案教育事业施展才华、作出贡献的机遇。这是比较平稳、少折腾的一段岁月，与国家的稳定局面是一致的。

加入民革

父亲是民革的前辈，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受他长期的影响，在他的决策下，我于 1986 年 5 月 8 日，即我父亲逝去后的第三天，被民革市委常委会批准加入民革。我 1949 年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1956 年加入共青团，1986 年加入了民主党派。虽然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但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盛善珠同志将党委要求我留在党外做好民革工作的决定通知我，这是党对我的关心和要求，我就一直按党的要求去做。

入民革后，先编入上海民革联合第一支部，在主委王弘之同志的领导下，担任支部委员。1987 年 7 月，民革上海大学支部成立，被选为支部主任委员。新

上海大学 1994 年成立后，担任民革上海大学总支部主委，直到 2002 年交班。

上大民革组织从始创的 5 人发展到近 50 人，在上大民主党派组织中有较大影响，与自己的努力、投入是分不开的。组织生活活跃，走访党员家庭，维护党员合法权益，及时传达政治信息，发挥党员各方面工作的积极性和作用，总支内多位党员担任市委专门委员会委员，由于这些工作成绩，民革上大支部多次被评为市民革先进。

从 1998 年起，我先后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学习与文史委员会主任，基层工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老同志学习联络组副组长。参加多次市民革代表大会的文件起草，担任《民革党员与新中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副主编。多次被评为民革“社会工作”、“参政议政”先进个人。还曾负责过民革市委宣传处工作。积极宣传民革历史，为众多支部作民革历史专题讲座。

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全身心投入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工作，本着“民革党员永不退休”的信念，我活到老，干到老。

当政协委员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我父亲参加政协活动以后，我就开始了解人民政协；20 世纪 80 年代，我作为随员，多次陪父亲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1988 年，我由民革市委推荐为第 7 届上海市政协委员。

1993 年、1998 年，由上海大学党委推荐，我任第 8、9 届市政协委员。

同时，我先后担任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本着参政议政的责任，在政协各种会议上，我都争取发言，在精神文明建设、市政建设、环保、教育、惩治贪腐等方面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设。

我在众多的提案和建议中，有些是难忘的。一是针对上海城市绿化，提出多种树的建议。此建议以“种树、种树、种树”为题，作为《联合时报》的头版报道。二是建议将贪污分子的“巨额不明来源财产罪”定为贪污罪，予以严惩，得到众多法学界人士的赞同。三是针对重要节日前集中处决犯罪分子的做法，提出参照我国历史上的重要节日前大赦的传统，不要在节日之前搞集中处决，以免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建议，得市政法委的重视，并上报中央政法委。现在已经不见此种始于“文革”的做法。四是与闵行区政协黄玉凤主席等联合提案，要求地铁9号线改变漕宝路沿线在地面上高架的设计，改为出七宝后才从地下出来，保持漕宝路的现状，此提案最终得到实现。

1989年市政协全会上与朱镕基市长对话，我发言提出市政府要树立、加强权威，不仅靠个人的权威，更重要是市政府的整体权威，得到朱镕基市长的共鸣。这段对话已经记录在《上海人民政协志》中。

我担当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期间，参加了全国政协由李瑞环主席倡导的全国政协和上海市政协的清理库存文史资料的审读、选编，后来出版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卷2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0卷。

我担当1949-1993、1993-2003两部《上海人民政协志》的编委。参加

1949-1993 政协志的方案、文稿讨论和审稿。参加 1993-2003 政协志方案的制定、撰稿和指导区县政协、市政协各部的撰稿和修改。

从市政协委员岗位上退下来以后，2003 年我开始参加上海市闵行区龙柏街道议事协商会议（简称议协）的工作。议协是街道党工委领导的统战性的整合人才资源的组织，吸收居住、工作在本社区的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含已经离任的）及各方面代表人士，为街道工作献计献策、参政议政。我被选为第 1、2 届副主席，第 3 届顾问。本着在市政协的一贯态度，认真投入，很愉快地为社区服务。

在 15 年市政协委员和退下来之后的时间里，自己学习、工作并进，在政治、思想、修养、学识各方面都得到很大教育和提高。这是个人人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一生有幸，20 世纪 80 年代，聆听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讲话；20 世纪 50 年代，近距离看到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儿时见到将被人民解放军赶出大陆前的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

1979 年全国政协 5 届 2 次会议，我陪同父亲，有幸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政协邓小平主席的开幕词，这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开篇之作，指导之言。从此以后，我与民主党派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一段生活，也是后半生工作的良好开始与延续。

1957 年 4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毛泽东主

席亲往北京南苑机场迎接，并陪同乘敞蓬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我那天从铁一号赶到天安门，被欢迎群众队伍推拥到敞蓬车车头旁，近距离注视两位领导人达十多分种。

1948 年，李宗仁先生被选上国民党政权的副总统后，曾来我家拜访，答谢我父亲对他竞选的支持，我在客厅里见到过他。

2005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主席诞辰。是日，第一次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身份参加上海市韩正市长与文史馆馆员的座谈会。由此，开始了文史馆馆员学习、工作的新征程。(写于 2009 年 5 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